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二十世纪德国国歌变迁

罗宇维

内容提要 国歌是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文化象征之一,是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纳粹统治与二战结束后两德的分立,为德意志建立统一、正义与自由的现代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德国国歌也因此面临着挑战。为了纠正纳粹时期对传统国歌的利用与操纵,德国在国歌的选择上尝试了三种策略,西德沿用旧国歌,东德另起炉灶创作新国歌,而重新统一的新德国则扬弃传统,采用《德意志之歌》。这一过程也从侧面证明了国歌这种文化象征物的重要性。

关键词 国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之歌》 《从废墟上崛起》

罗宇维,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100875

现代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的建构,既可以从制度和物质层面进行观察与总结,也不应当遗漏在这个过程中,为创造和维系对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而出现的文化象征与策略^[1]。一方面,现代国家的建构本身就涉及一整套关于个人认同与政治共同体观念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各种文化象征的创造、传统的发明以及仪式的运用;另一方面,就现实历史的观察而言,诸多现代国家在其发展历程之中,也都颇为重视生产和选择能够代表自身特征,塑造群体认同的各种文化象征^[2]。在诸种文化象征中,国歌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切入点和观察对象。首先,它是现代国家在象征物上的标准配置。在国际活动中,它是官方确认的国家歌曲代言;在共同体内部,它是爱国主义教育必需内容,通过演唱、演奏、合唱国歌等方式,营造出特定的场域,为共同体成员提供共时性的感知和认同。此外,要成为国歌,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需要具有特定的政治意涵,尤其是爱国主义内涵。当然,这些意涵既可以来自歌曲本身,也可能受益于某些历史事件的影响与书写。总而言之,国歌是现代国家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叙事。结合具体的案例,对国歌进行分析理解,可以更好地认识现代政治共同体建构这个重要议题。

[1]Anthony D. Smith, "The Rites of Nations: Elites, Masses and the Re-enactment of the 'National Past'", Rachel Tsang, Eric Taylor Woods (e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Building: Ritual and Performance in the Forging of Nations*, Oxon: Routledge, 2014, p.21.

[2][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许多研究者认为,德国代表着一种现代国家建构的典型模式,其中,文化理想和传统为地理和现实意义上分裂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统一动力和凝聚力^[1]。不过,由于历史负担和政治现实,二十世纪的德意志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德国现行国歌《德意志之歌》(后文简称《德意志》)的际遇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状况。作为曾经十分流行的民族主义歌曲,它被魏玛共和国定为国歌,随后又由于纳粹的利用负载了新的意义,成为两德在建构各自认同时必须处理的棘手问题。随着冷战的戛然而止,使用《德意志》来重新凝聚认同,成为新德国建构认同的选择。

一、“统一、正义与自由”与“高于一切”之歌

歌曲《德意志》创作于1841年,歌词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为呼吁民族统一、唤起民族精神而创作的一首诗歌。诗歌在写成以后被配上海顿创作的奥地利国歌旋律,此后成为德意志境内颇受欢迎的爱国和民族主义歌曲。全歌共分三段:第一段直抒胸臆,勾勒了德语区的地理范围,以“德意志高于一切”为口号,表达诗人渴求建立现代国家、实现民族统一的希冀;第二段遵循浪漫主义传统,歌颂寓于民众和民族风俗中的民族精神;第三段则提出了理想中德意志的政治价值追求——统一、正义与自由。三段歌曲从不同的角度勾勒出诗人心中的德意志国家理想。然而,歌曲虽然被当时的民众誉为国歌,却因其温和立场而未被俾斯麦看中,第二帝国选择《向德皇敬礼》(Heil Dir in Siegerkranz)作为国歌^[2]。

直到1922年,魏玛宪法通过三周年时,《德意志》才获得国歌的地位,正式成为魏玛共和国国歌,时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演说中如此描述它的政治含义:

我们不想要内战,不要族群的分裂……我们渴望统一、正义和自由!这首歌曲的这三组词汇中凝聚着诗人对德意志内部支离破碎局面的全部感受……黑红金三色旗之下的统一、正义、自由之歌应当成为我们爱国情感的表达。^[3]

历史的反讽在于,随后不久,这首歌便开始被视为推崇种族主义、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歌曲,而这主要是由于纳粹政权对歌曲的利用和操纵。

在艾伯特正式确认了《德意志》的国歌地位后,歌曲开始被更加广泛地传播和接受。不仅国会会议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开始或结束时都需要演唱,民间的各种文化演出、沙龙和酒馆中,也会不时响起国歌的旋律。新技术也成为传播的重要途径,当时的德国广播节目中,有长达一小时的晚间“广播音乐会”,以军乐队演奏的国歌作为结尾^[4]。此外,《德意志》还被作为文化资本,用在商业产品之中。1930年代一组奥地利国家烟草的广告就是例子:海顿作为德意志民族象征,出现在海报上,广告卖点则在于音乐家创作了《德意志》^[5]。正因如此,我们或许可以判定,《德意志》作为共和国在音乐上的象征符号,已经具有较为稳定的意义与内涵,代表着德意志民族和传统。

希特勒上台后,为表现出与德意志传统的联系,获取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利用《德意志》就成了情

[1]“这些知识分子缔造了德语民族的民族认同,而在这种集体沸腾中他们被允许发挥核心作用。德意志民族主义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见[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47页。

[2]《德意志之歌》之所以能够在魏玛时期具备成为国歌的条件,还与它在一战时期兰格马克战役中的历史书写有关,笔者另有文章专门讨论,也可参见George L. Mosse, *Fallen Soldiers: Reshaping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W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70-73。

[3]转引自Günter Spindel, “Zum Deutschland-Lied als Nationalhymne”, *JuristenZeitung*, 43. Jahrg., Nr. 15/16, p.745.

[4][5]Brian Currid, *National Acoustics: Music and Mass Publicity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p.19、129.

理之中的选择,以至于“诙谐的柏林人”不无讽刺地将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国会戏称为“昂贵的合唱团”,指出其主要任务就是唱《德意志》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后文简称《韦塞尔》)^[1]。

在反复地演唱和其他意识形态宣传手段的共同配合之下,《德意志》与魏玛共和国所宣称的统一、正义与自由理想被忘却,歌曲只剩下被赋予新含义的“德意志高于一切”口号,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表征。纳粹政权也主动对歌曲进行了调整以满足自身的统治需求。纳粹当局深知,旋律简单、歌词抽象的作品可以更好地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和灌输,《德意志》缘此被改名为《德意志高于一切》(后文简称《高于一切》),只有第一段被允许演唱,就这样,“高于一切”的口号掩盖了歌曲本身具有的进步内涵^[2]。到1934年,几乎所有的德意志学校在学期结束时都会举行焚书活动,学生们也是伴着《高于一切》和《韦塞尔》的歌声,将《塔木德》、《古兰经》、莎士比亚作品、《凡尔赛和约》甚至《圣经》扔进火中^[3]。

当然,真正将歌曲与纳粹意识形态捆绑起来的关键事件是1936年奥运会。在1936年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德意志》和《韦塞尔》被反复奏响,每一次的演奏都伴随着希特勒崇拜者们的疯狂回应:

4点5分希特勒到达自己的包厢,他毫无疑问才是奥运会的明星……乐团奏起《高于一切》和《韦塞尔》……尽管两首歌都不合时宜,观众们却真心诚意地应和起来……“每个人的眼眶中都充满着泪水”。^[4]

在纳粹政权的操纵之下,《德意志》就迅速从赞美“统一、正义与自由”的国歌转变为宣称“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纳粹歌曲。

二战的失败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纳粹战败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几十年德意志民族身份的内涵,用克劳迪亚·孔茨的话说,“他们将其称为‘零时刻’(Stunde Null),在对纳粹主义的拒斥的基础之上塑造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5]。不过,身份认同本身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斯洛班·卡塔戈就指出,“身份认同”并不意味着一种单数的、同质化的认同,而通常是一系列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身份的认同^[6]。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德意志人对自身身份认同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都折射在对“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理解上。

对于多年经受人道主义观念洗礼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许多人因为在纳粹时期的立场而羞于表态,失去担任“民族良心”的资格,而在纳粹时期反对其政策甚至因此遭到迫害的那些人,或是完全放弃了复兴的希望,或者是陷入深重的羞愧和忏悔中。小说家恩斯特·维歇特就告诉德意志同胞:“我们是孤独的,以往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像我们这样孤独;我们蒙受了耻辱,以往没有别的民族受过这样的耻辱。”^[7]

不过,等不及德国人自己来面对和处理种种问题,盟军的遏制措施就已经开始实施了。1945年7月14日,盟军在柏林设立的控制委员会下达命令,严令禁止演唱和播放《高于一切》,并试图推广名为《我已经坦然接受》的歌曲作为“国歌”。在委员会看来,这一举动不仅回应了反纳粹的德国民众,更是为了纳粹占领区曾经遭受恐怖统治的人们,因为《高于一切》的旋律会让他们联想到之前的可怕境遇^[8]。

[1][7][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79页,第729页。

[2]F. Gunther Eyck, *The Voice of Nations: European National Anthems and their Author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5, p.174.

[3]Don De Nevi, “The Nazi University Eclipse”, *Improv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Vol.18, No.4, Aut. 1980, p.288.

[4]Guy Waters, *Berlin Games: How the Nazi Stole the Olympic Dream*, London: John Murray, 2006, p.454.

[5]Claudia Koontz, “Between Memory and Oblivion: Concentration Camps in German Memory”, John R.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63.

[6]Slobhan Kattago, *Ambiguous Memory: the Nazi Past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Westport: Praeger Press, 2001, p.2.

[8]Margarete Myers Feinstein,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The National Anthem Debat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33, No.4, 2000, p.506.

但是,这条法令在德国境内的推行并不顺利,人们很快又重新唱起了《德意志》。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十分复杂,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对纳粹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已然熟知,而知识分子们也意识到了纳粹统治造成的德语含义的扭曲和丧失,而在语言的“真诚性”缺失的状况之下,无论“高于一切”还是“低于一切”,都毫无意义^[1]。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曾经担任过《法兰克福报》编辑的本诺·赖芬贝格在《当代》的首刊中表示,反省不能靠命令,必须是自觉和自愿的,“忏悔愈是默默地、隐秘地在内心进行,价值就愈是纯洁”。

当然,知识分子的反思与现实的政治安排并不合拍,随着苏联与英法美各自对占领地区控制的收紧,如何理解德意志的过去和传统,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就不仅是德国人自己的问题,也关系到局面的稳定。大致说来,身份认同的建构首先需要对群体身份或宽泛或精确的界定,这种界定,必然意味着对“我们”和“他者”的区分和识别,并且通常都是借由对“他者”的否定来实现的。不过,由于东西德的分立,当时的问题就更加棘手了——本来民众曾经拥有一致的德意志认同,这种德意志身份曾经是实现统一的动力,而如今,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下分立的两个政治单元必然要求为民众确立各自不同的身份。就此,两德各自采取不同策略:东德试图与过去告别,建立新国家和新身份;西德则尝试对传统进行利用,以获取更多的合法性资源。于是,对《德意志》的不同处理策略出现了。

二、向过去告别:东德的选择

二战结束后的苏占区,一方面重新统一的呼声依然强烈,另一方面,当局需要向民众证明,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德意志才是真正的德意志。反映在国歌的选择上,东德开始了一系列的尝试。首先是对统一和传统的继续坚持,1947年第二届议会召开之际,东德政府选取了一首充满19世纪民族主义情怀的歌曲作为会歌:

故乡,我们绝不抛弃你
你是我们的梦想与归属
充满欢笑与泪水的土地
你是我们的歌,我们的光!

当局不断挖掘浪漫主义民族传统的资源,法勒斯雷本的另一首诗歌被直接改编,配上旋律,成为东德人民警察的进行曲^[2]。

东德的知识分子也曾经尝试为《德意志》辩护,认为歌曲的问题在于人们对它的误解,而歌曲本身的意涵实际上是善良美好的,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就以此为主题,写了一首名为《儿歌》的诗作:

既不是高于也不是低于
我们想与其他民族所处的位置,
从大海到阿尔卑斯山
从奥得河到莱茵河。
因为我们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好,
我们热爱它捍卫它。
愿它在我们眼中永远最为美好

[1][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25页。

[2]Dietrich Orlow, “The GDR’s Failed Search for a National Identity, 1945–1989”, *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29, No.3, Oct., 2006, p.543.

正如其他人看待他们自己的故乡一样。^[1]

不过,知识界的辩护并未受到认可,对纳粹传统斩钉截铁的否定才是主流。

随着东西德对抗的不断加强,“民主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看法为东德争夺合法性话语权提供了基础^[2]。在这种逻辑下,西德和资本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要战胜的对象,而且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曾经导致法西斯主义,西德也应当受到批判和否定。进一步而言,要否定西德政府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统治,很大程度上需要否定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许多内容,换句话说,东德需要展现出自己与过去告别,从“零时刻”出发,在废墟上崛起的决心。在这种背景之下,后来成为东德文化部部长的诗人约翰内斯·R.比彻在1949年为了反对《德意志》,专门写作了一首诗歌,激励苏占区的德意志人通过不断发展来实现统一:

从废墟上崛起
 望向未来,
 我们将善好奉献给你,
 统一的祖国德意志。
 古老的痛苦将被克服
 我们团结一心
 我们必须胜利,
 美丽的阳光【方能】
 照耀整个德意志……^[3]

这首诗歌既表达了其面对过去,通过重建来走向美好未来的积极意向,又不忘对统一德意志的追求,将自己描绘成德意志传统的承袭者和发扬者,满足了东德国歌选择的需求。作曲家汉斯·艾斯勒随后为其谱曲,东德建立一个月后,政府正式宣布它为国歌。

顺着这种策略,在东德随后的官方话语中,《德意志》就成了西德的国家定位与政治行为的象征,批判歌曲就是攻击对手,以至于当联邦德国正式宣布《德意志》为国歌时,东德的报纸也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

帝国主义者唱着“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实际上想说的是利益高于一切,控制石油高于一切,军备生产高于一切。帝国主义者唱着“和谐(concord)、正义与自由。”和谐?他们一边唱着这个词,一边试图分裂德意志……正义?他们一边破坏宪法的全部条款,以便通过国家行动来推行战争合约,一边唱着这个词。自由?他们唱着自由的同时,正在通过战争合约将德意志的自由出卖给外国的帝国主义同盟。^[4]

然而,这一策略并未能真正助益实现东德建构新身份认同的目标。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说,一方面,1961年柏林墙的修筑给“统一的祖国”这一观念画上了休止符,生活在两种制度下的民众渐渐习惯了分隔状态,甚至出现了“东德佬”“西德佬”这样的称呼,以凸显差异;另一方面,东德的政治目标也从最

[1]Jost Hermand, “On the History of the ‘Deutschlandlied’”, Celia Applegate, Pamela Potter (eds.), *Music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262.

[2]Peter Davies, “Hanns Eisler’s ‘Faustus’ Libretto and the Problem of East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Music & Letters*, Vol.81, No.4, Nov.2000, p.587.

[3]中文歌词根据英文译本译出,完整的歌词可参见<http://www.nationalanthems.me/east-germany-gdr-auferstanden-aus-ruinen/>.

[4]Margarete Myers Feinstein,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The National Anthem Debat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33, No.4, 2000, p.528.

初的统一和复兴，转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反映在官方话语上，国家(State)逐渐取代了民族(nation)。就此而言，东德着实在努力与过去告别。

吊诡的是，虽然为了与过去告别而否定《德意志》，但歌曲却以另一种方式不断产生影响。由于比彻在创作《从废墟上崛起》时，有意识地要否定《德意志》，《德意志》反倒成为比彻遣词造句的参照，以至于东德国歌也可以用海顿的旋律来演唱。1973年东西德国同时进入联合国，在各自国歌奏起时，便很容易产生混淆，自此以后，东德的国歌仅仅保留旋律，而不再演唱歌词。

三、为传统辩护：西德的路线

与东德的策略不同，西德则更想接续希特勒之前魏玛共和国和德意志邦联传统。此外，它还要处理本国内部不同派别对不同政治符号的看法，寻找共识，找出身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总而言之，联邦德国也需要一套新的符号象征系统，这套系统既要凸显出自己与纳粹德国的差别，也要与民主德国进行区分，还需要包涵历史传统中的德意志特征。

国旗的问题在政府建立以后很快就得到解决，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黑红金三色旗被沿用，表征着1848年民主革命的情怀。然而，《德意志》是否应当继续作为国歌，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依然有一批人不愿放弃《德意志》这个魏玛共和国曾经的文化象征，试图复兴其原初意涵，以此展现出现有政权与魏玛共和国的连续性。在这一背景之下，公共舆论和政府内部的不同派别，参与到了是否再次以《德意志》为国歌的讨论之中。

大致说来，从1949年到1966年，联邦德国的政府是由天主教民主联盟(CDU)、天主教社会联盟(CSU)和自由民主党(FDP)等右翼政党联合组阁，政府决策也成了这些党派之间的立场较量和妥协。在国歌问题上，一些人认为《德意志》在纳粹时期的滥用和扭曲是无法洗清的历史负担，另一些人则觉得这段历史可以忽略。而占据多数的则是两派之间持实用主义立场的人。阿登那就表示，虽然《德意志》有历史污点，但它依然是最能凝聚德意志民族意识，代表德意志传统的歌曲，而且就它与纳粹的关联而言，问题实际上出在紧随这首歌之后的《韦塞尔》身上，只要加以限定，这首歌仍是国歌的不二之选^[1]。

认为应当忽略歌曲由于纳粹时期而背负的种族主义含义的，大多数是被东德驱逐，主张收复领土再次统一德意志的“传统派”。联邦德国建立后不久，12位政府议员联合提议，将完整版的《德意志》立为国歌，理由是：“法勒斯雷本的歌词并不是狂妄自大，也从来不是为了将其他人民和国家诋毁成二等，它的初衷是一种自然的、自明的民族意识。”^[2]

当然，在为歌曲进行强力辩护的背后，也有“传统派”对自己处境的考虑。对于他们来说，“德意志高于一切”这一段唱词可以并且应当继续沿用，因为歌词也为他们提供了重新统一两德、回到故乡的理由。况且，在两德分立国家满目疮痍的状况下，“德意志高于一切”是在向整个民族发出更高的号召，提醒大家“统一、正义和自由”的理想战胜了恐怖统治，呼吁人们对德意志抱有信心^[3]。

除了向政府提议，“传统派”为了帮助歌曲洗清嫌疑，还将歌词和旋律分开来辩护。首先，作为纯艺术的旋律显然不会受到纳粹的玷污，引用海顿自己在日记里的言辞，他们试图表明，《德意志》旋律的效用不是激起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情绪，而是“安抚心灵，振奋人心”，这首就艺术水平来说称得上民族骄傲的曲子，不应该因为纳粹的扭曲而被抛弃。一些人还认为，再也不会比这首曲子更好的选择了，音乐家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就表示：“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旋律像这首曲子一样表达和凝聚

[1][2]Margarete Myers Feinstein,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The National Anthem Debat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33, No.4, 2000, pp.505-531, p.511.

[3]Paul Sethe, “Das Lied der Deutschen,” *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 10 May 1952.

着我们所谓的德意志观念。”^[1]

当然,歌词才是《德意志》被抨击诟病的主要方面。对此,也有继续为第一段歌词进行辩护的人,认为只有德语不够娴熟的人,才会将“高于一切”误会为极端激进的种族主义号召,对德国人来说,这个短语表达的其实是一种个人的情感选择。而更加富有实践智慧的“传统派”所采用的策略是,强调第三段的进步含义,将“自由”排到“统一”前面,“统一”则被解释为“和谐”和“友爱”。

不过,对纳粹深恶痛绝的右翼议员们对以上说辞并不买账,他们坚持认为纳粹的污染是不可逆转的,无论是伟大的海顿,还是持自由民主立场的法勒斯雷本,都不可能再次成为新的德意志代言人。于是,议案被提交后,议会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无法达成共识,议案继而转给了法律事务和宪法委员会处理。对这个“烫手山芋”,委员会也莫衷一是,又将决定权推给总统,其理由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意志》的国歌的地位是由总统来宣布的,而且这条动议“太富有争议”,委员会无法承担此项责任。

反对《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随即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历史学教授和自由民主党党员西奥多·霍伊斯在给首相阿登那的信中明确表示,他认为“在目前德国历史的困难时期,需要一种新的象征来严肃认真地澄清德意志人命运中的历史性悲剧”^[2],而《德意志》的旋律和歌词无法实现这个目标,而且与战后世界的主流也不协调。

霍伊斯坚决主张摒弃法勒斯雷本的诗作,也不想就海顿的旋律来填词,因为如果继续使用同样的旋律,那么很可能会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那些“忠诚的”爱国者表面上唱着新歌词,但持“军国主义”立场的爱国者则会唱起法勒斯雷本的歌词。于是乎,他便试图给出替代方案,寻找一首能够传达德意志精神并塑造新国家形象的作品,私下邀请诗人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和作曲家赫尔曼·鲁特尔来创作一首新国歌,名为《德意志颂》。

然而,连霍伊斯自己都不满意这首歌曲。与此同时,各种政治、文化和体育活动对国歌的需求则依然迫切。在这种情况下,全德事务部部长提议,使用《德意志》的第三段作为国歌,而霍伊斯则继续拖延以找到更好方案。出于对霍伊斯的不满,联邦德国的运动员甚至提议在参加国际赛事播放西德国歌时,以一分钟的沉默进行替代。公共领域中支持《德意志》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法兰克福报刊登了许多持这种立场的读者来信,大致上都是从德国的传统和统一的愿望出发:“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祖父满怀深情唱起来的歌曲应当被摒弃。”“让我们与旧国歌同在!我们依然是德国人!”这些读者认为,《德意志》的第三段最不当被遗忘,它是“易北河东西两岸整个民族依旧拥有的为数不多的象征”^[3]。

《德意志》命运的转折点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中。1952年的奥运会是德国分裂以后的第一次奥运会,活动需要西德拿出一套连贯清晰的符号来代表自己的国家,既同东德政权进行区隔,同时又强调自己作为德意志共和民主传统继承人的地位。到这个时候,找不到替代品的霍伊斯不得不妥协,采取务实的方案,将《德意志》的第三段确立为国歌。1952年5月6日,西德报纸上刊登了霍伊斯和阿登那的通信,其中要求将“法勒斯雷本-海顿之歌确立为国歌,在国事活动上演唱第三段”^[4]。

当然,霍伊斯妥协的前提是,也必须限定歌曲的政治信息和立场,联邦德国所能继承的仅仅是1848年民主革命的传统。阿登那等人对此并不拒绝,毕竟哪怕仅演唱第三段,也符合“众多德意志人强烈的传统主义”情绪。

只不过,政治家的细心谋划并不能限制现实事件的进展。1954年,西德足球队赢得了在瑞士伯尔尼举办的世界杯,对于这个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处在压抑之中的民族来说,这次胜利不仅是体育的胜

[1][3][4]Margarete Myers Feinstein,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The National Anthem Debat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33, No.4, 2000, p.516, pp.520-521, pp.527-529.

[2][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52页。

利,也是民族自豪感的出口,“伯尔尼的奇迹”这一说法应运而生^[1]。在胜利之时,赛场上的德国民众齐声唱起了《德意志》,但是唱的却是被视为“帝国主义”禁忌的第一段。

随后,恢复前两段的主张又开始出现。1959年,联邦德国的内政部长提议恢复这首歌的第一二段,遭到霍伊斯的反对。巴登符腾堡州的基督教民主同盟在1985和1986年提议德国高中生应当掌握这首歌的全部三段。1989年,在基督教民主同盟成员的克里斯蒂安·瓦格纳主导下,黑塞州通过一项法规,要求高中生必须背下歌曲的全三段^[2]。然而,虽然恢复歌曲全貌的尝试一直出现,但是联邦政府立场也十分坚决,1990年初,联邦宪法法庭做出裁决,认为保障国家象征的相关法律只适用于《德意志》的第三段,否定前两段的官方国歌地位^[3]。

四、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再次统一后的《德意志》

1990年10月3日,两德正式宣布统一。柏林又响起《德意志》:当天中午,德意志议会议员们在部分修复的国会大厦中召开会议,齐声唱起这首歌,在随后的庆祝活动中,参与庆祝的民众们异口同声地唱起了这首“统一、正义与自由”之歌^[4]。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波折以后,《德意志》再次成为统一德国的音乐象征,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追问一句,为什么还是这首歌?

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作为现代国家的文化象征,国歌已是政治共同体的必需品,换句话说,德意志当然需要一首国歌。更现实的原因在于,两德合并的进程以及随后的建制在很大程度上由西德主导,沿用自己的国歌,也符合情理。不过,这个问题的深层答案,则需要综合考虑德意志传统、冷战后的德意志认同以及国歌的政治功能等方面。

首先,冷战以后德意志的身份认同一直处在分裂和冲突中。1989年11月9日,随着“我们必将胜利”“柏林墙必须倒塌”和“柏林墙已经塌下”的歌声,德国再次统一被提上日程。不过,统一的道路并不好走,摆在两德民众面前的,是遥远统一的旧梦与现实认同分歧之间的巨大鸿沟。当时流行的一个笑话说,当东柏林民众在柏林墙倒塌后亲热地招呼西柏林民众时,喊出了“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的口号,然而西柏林人的回应则是一句冷淡的“我们也是”(Ja, wir auch)^[5]。

实际上,虽然西德基本法序言中就将追求“统一和自由”列为目标,《德意志》第三段对“统一、正义与自由”的歌颂反复唱响,但是生活在联邦德国的民众们已然形成了新的认同。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前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仅有56%的西德受访者认为再次统一应该继续作为政府的“目标”;在另一项电话调查中,只有24%的受访者认为,在接下来的十年内,有希望看到两德统一^[6]。而柏林墙的另一端,情形也十分类似。随着冷战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剧,二战结束后被视为政治资源的民族主义被遏制,经

[1]Kay Schiller, “‘Siegen für Deutschland?’ Patriotism, Nationalism and the German National Football Team, 1954–2014”,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40, No.4, (154), 2015, pp.179–181.

[2]Michael E. Geisler (ed.), *National Symbols, Fractured Identities, Contesting the National Narrative*, Vermont: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5, p.71.

[3]西德刑法规定,污蔑国歌的行为构成犯罪,但是对于国歌的具体内容并未进行规定,因此才有了宪法法庭的进一步补充。参见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7 March 1990). “Case: B Verf GE 81, 298 1 B v R 1215/87 German National Anthem–Decision”. Institute for Transnational Law–Foreign Law Trans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chool of Law.

[4]F. Gunther Eyck, *The Voice of Nations: European National Anthems and their Author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5, p.175.

[5]Mary Beth Stein, “The Present is a Foreign Country: Germany After Reunification”,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30, No.1, Jan.–Apr., 1993, p.41, no.2.

[6]Peter H. Merkl, *German Unification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22–123.

过计划经济的重新整合,民众生活已经形成了新的特色。两方的区别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当东西柏林自由通行后,西柏林人形成了一整套“日常诠释学”来对东柏林人进行鉴别:他们衣着过时,以家庭为单位行动,在进入商店之前会驻足观看,习惯在公共建筑前排队,诸如此类^[1]。

这种现实局面迫使人们必须找到能够弥合分裂,唤醒和稳固共同体认同的要素,而曾经在魏玛共和国和西德都用作国歌的《德意志》,顺势成为新德国音乐传统的最佳选择,因为它联系起了过去的传统和未来的方向。

一方面,在经历了历史变迁和冲击后,《德意志》不再是一首可以被随意取消的政治歌曲,而是镌刻在历史中的民族记忆,成为德意志追求统一和自由的文化象征。在公开发表在1991年8月27日联邦共和国新闻和信息部的公报上的一封信函中,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就表示,“法勒斯雷本-海顿之歌的第三段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它表达了作为德意志人、欧洲人和世界共同体成员的德国人所秉持的价值”。

另一方面,使用《德意志》而非寻找其他歌曲,实际上更有利于重新建构起德意志认同。正如霍布斯鲍姆和兰格在《传统的发明》中所指出的,为了给生活在变动不息的现代社会之下的共同体成员们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现代国家热衷于发明各种传统,以制造出历史延续的印象^[2]。就此而言,《德意志》既有相对悠久的历史,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用作国歌,因此,再次使用它,也是重新统一的德意志对魏玛共和国和德意志传统的回应。

最后,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并非是某种永久不变的存在,相反,它既可以被建构,也需要日常维系,用勒南的话来说就是,“日常的公民投票”彰显着我们的认同和归属^[3]。就此而言,《德意志》虽然被继续使用,但是其文本和意义受到了严格限定。重新统一的德意志必须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对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拒斥,使人联想起纳粹统治的“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及有种族主义“嫌疑”的第二段歌词依旧被禁止。

直到目前为止,国歌依旧是现代政治生活中最常见的文化象征,它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功能需要被进一步认识。一方面,《德意志》这首德国国歌在20世纪的变迁过程,恰好印证了国歌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以在国定假日所唱的国歌为例。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将我们全体联结起来的,唯有想象的声音。^[4]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形象地描绘了国歌对于现代国家建构和身份认同维系的重要作用,放在重新统一的德意志身上,这首被修正和限制的《德意志》,或许就是连接起德意志民族成员的“想象的声音”。

另一方面,以政权法令规定来建立和推广“全新”和“独特”的国家象征与借“传统”之力来对既定体制进行正统化和合法化辩护^[5],其各自优劣与功效也可以从德国国歌的这段历史中窥见诸多经验。就此而言,国歌的政治功能与特征,是一个需要得到更多思考与讨论的议题。

〔责任编辑:史拴拴〕

[1] Mary Beth Stein, “The Present is a Foreign Country: Germany After Reunification”,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30, No.1, Jan.-Apr., 1993, p.41, no.3.

[2] [英] 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3]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p.19.

[4]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39-140页。

[5] [日] 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页。